

白居易 論衡

蹇长春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I206.2
221

白居易論稿

蹇长春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论稿/蹇长春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587—746—7

I. 白… II. 蹇… III. ①白居易(772~846)—
文学研究②白居易(772~846)—人物研究
IV. I206.2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233 号

书 名 白居易论稿

作 者 蹇长春 著

责任编辑 刘兰生

封面设计 张学乾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 址 www.dhwycbs.com

邮 箱 gy@dhwycbs.com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7—80587—746—7

定 价 26.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卞孝萱

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的李、杜,中唐的韩、白是人所公认的伟大诗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研究的人多,成果也就多,要想突过前人,诚非易事。友人蹇长春教授,以数十年的精力,专心致志于白居易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今自选二十余篇,编成一集,题为《白居易论稿》,远道邮示,嘱为序言。细读之后,觉得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色。

一 把作品与作家及其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全方位地加以研究

鲁迅说得好:“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因为,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外化,而作家又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存在,他的思想感情,必然要受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只有把作品与作家及其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全方位地加以研究,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一般方法论原则。长春教授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就是结合白氏的生平仕历及其作品,并关照到中唐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著者指出,白氏前期“志在兼济”,积极进取,与元和前期士人们渴望“中兴”,人心思治的政治氛围有关;而贬江州之后,反思官场的险恶,逐渐以“中隐”为“独善”之计,这固然受到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为宪宗晚年的倒行逆

施,及接踵而来的穆、敬、文、武诸朝,国是日非,大唐帝国日益走向衰飒没落的历史大趋势所决定的。至于把元和十年白氏因论事遭贬,看作其思想变化的契机,只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在论及元和十年白氏贬江州之际,王涯为什么落井下石的问题,著者不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为王涯的个人品质,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出:王涯诬陷白居易,固然出于其贪婪、阴狠的本性,但更主要的是为了迎合皇帝,讨好守旧的官僚集团,特别是讨好“恩顾莫二”、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吐突承璀。这样看问题,是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

二 在对知识的把握与运用上,做到文史哲诸领域的兼顾与融通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世纪以前的文化,大抵是文史哲浑然一体的。研究作家作品以及治文学史,便不能仅仅着眼于文学本身,还必须兼及哲学与史学。这对于研究这位儒释道思想杂糅、生平经历曲折而漫长的白居易来说,尤为重要。为了对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进行深入精当的剖析,著者除对白集文本下大功夫而外,对思想史、文学史及有关文献资料的把握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还选读了一些有关佛家与道家的著作。有了这样的积累,著者对白氏的思想和创作进行总体把握就能游刃有余,并时见胜义。著者着眼于白氏前期“志在兼济”,锐意进取的政治表现,以及积极反映生民疾苦的创作倾向,把他的前期思想定位为激进的民本主义。认为这种思想远绍先秦儒家“贵民”、“保民”的民本传统,并受到唐代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贞观政要》的影响。进而指出,白氏民本思想的内在结构,源于其《新乐府序》所标榜的“为君、为臣、为民”三个层面,具体表现为:弘扬君道,鼓吹仁政;勉励臣节,崇正疾邪;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等三个方面。前两者主要见于白氏《策林》及谏奏中,后者则更多地见于其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中。以江州之贬为分界线,白氏后期的思想由“兼济”转向“独善”,他融汇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知止”,从而形成了其后期儒道互补的中庸主义思

想,并以之作为支配其思想行为的杠杆,具体表现在:在出处进退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对待朋党之争,持中立调和的态度;对待儒释道三教持兼容并包的圆融立场。析论精当,新意叠出。如果没有对文史哲综贯融通的学术底蕴,对白氏总体思想的把握与剖析,很难达到这样的深度。

三 理论与实际结合,观点与材料统一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一般地说理论即观点,实际即材料。如果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形成自己的观点,则可能使自己的探索停留于现象的描述与材料的堆砌的层面上,从而流于繁琐,使人不得要领;如果不在材料的搜集、甄别与疏理上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不用确凿而充分的材料去印证自己的观点,架空议论,则难免使自己的研究流于空疏,缺乏说服力。著者的白居易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与材料两个方面都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并较好地解决了这两者相结合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著者应日本东京勉诚社之约而作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及《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分别载该社编印的七卷本《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二、五卷)两文,就是在正确的文艺观点的指导下,通过认真细致地搜集材料,加以深入地分析、综合与概括,而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前者触及到白诗研究中长期聚讼不休的一个热点——《长恨歌》主题。著者摒弃了“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谕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这样,就有分析地肯定了各派观点的合理性,避免了其片面性,变以往论争中各派观点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对于持续多年徘徊不前的《长恨歌》主题研究,无疑是一个新进展。后者虽是一篇研究述评,但能在翔实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我国上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近80年来关于白居易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在概略性地巡礼的基础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述。视野

开阔,持论公允,提供的信息量大,有裨于推进白居易研究的深入。《白居易研究讲座》编委、日本大阪帝冢山学院大学下定雅弘教授称赞该文“内容周密,笔力雄浑,可以说是确定历来膨大的白居易研究的位置;而指示今后我们应该注意的分野、该走的方向的一张巨大地图。”如果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是很难达到这样的学术境界的。

四 虚心汲取借鉴,勇于守正出新

学术研究,有如接力赛跑,前人的终点,即是后人的起点。不借鉴前人在某一领域探索的成果,便不易找到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径,难于取得较高的起点。著者的白居易研究,认真汲取和借鉴了陈寅恪、岑仲勉两位前辈以及时贤的研究成果,引用时一一注明出处,表现出虚心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著者善于鉴别前人成果的得失,坚持守正出新。长春教授不囿于陈寅恪所谓白公“外虽信佛,内实奉道”,“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的论断,结合白氏的生平,凭借坚实的证据,提出入世淑世的儒家思想是白氏一生思想的主干,只不过其前期思想表现了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即体国爱民的激进的民本主义;在后期,依然是“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表现为儒道互补、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这样分阶段地,从动态中去把握白氏的思想,显然更符合白氏思想的实际。1985年前后,学术界出现了贬低白居易,并进而否定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倾向,著者不随声附和,毅然发表《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一文,指出:一个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由李绅及张籍、王建、唐衢、邓鲂、李余、刘猛等积极参与和支持,以反映时事、关心民瘼为主旨的新乐府诗派确实是存在的,这一诗派的存在及其文学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就叫做新乐府运动。此文发表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追溯“新乐府运动”这一提法的由来时,著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即指出,这是胡适于1922年在其《白话文学史》中第一次提出来

的。此后,在论及白氏诗歌主张的现代意义时,著者又指出:把“五四”时期风行的“为人生”的艺术观同白氏“有所为而作”的主张联系起来,从而赋予白氏诗论以现代意义的,仍是胡适(见《白话文学史》第十六章)。这种不随俗俯仰,不因人废言的学术胆识和原则性,也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在白居易的研究队伍中,长春教授是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难能可贵,正在于此。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我还得知,由长春教授承担的《白居易评传》,经数年精心结撰,已交由我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审订付排,即将出版。《评传》稿获“中心”同仁们的好评,被认为是丛书中质量上乘的力作。由于有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取得如此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近十年来,我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约请长春教授为本书分典副主编兼“唐文学部三”(中唐)主编,在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对其人品与学问,极为赞赏。今喜见其《论稿》出版,故不辞衰朽而为之序。

2001年之重阳节,于南京大学之冬青书屋。

目次

序.....	卞孝萱(1)
--------	--------

上篇 生平与思想

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	
——白居易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述略	(3)
白居易思想论略	(29)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论江州之贬是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	
兼与王谦泰先生商榷	(59)
白居易的江州之贬与王涯的落井下石	
——兼论元和朝局及乐天遭贬的政治原因	(99)
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	
——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	(133)
白居易的佛教信仰	(140)
《三教论衡》简析	(146)

中篇 诗论与创作

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	
历史背景	(151)
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	
——关于白居易评价的一个问题	(172)

2 白居易论稿

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	(199)
《长恨歌》主题平议	
——兼论《长恨歌》悲剧情蕴的多层次性·····	(223)
以声写情的千古绝唱《琵琶行》	
——兼论白氏长篇叙事诗的艺术特色·····	(249)
试论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	(254)
白居易诗论的美学意义·····	(264)
从“有所为而作”的主张到“为人生的艺术观”	
——白居易诗论的现代意义·····	(279)

下篇 白集杂论

《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	
——兼论白居易的早期思想·····	(287)
唐人为什么重视判的写作·····	(322)
关于《白氏六帖事类集》·····	(331)
从《不致仕》看白居易的廉退思想·····	(336)
白居易《失婢》诗考辨·····	(342)
也说“青衫”与“江州司马”·····	(348)

附 录

《长恨歌》主题讨论述评·····	(357)
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	(365)
后 记·····	(392)

上 篇

生 平 与 思 想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

——白居易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述略

任何一位卓越的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及其思想渊源,他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以及其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固然都摆不脱传统的羁绊,但更主要的是根植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土壤之中,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作为中唐诗坛重镇,与李杜差可比肩的伟大诗人白居易,自然也不能例外。他那带有悲剧色彩的曲折而漫长的一生,他在仕途上的出处进退,荣瘁升沉,无不与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日益走向衰飒没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时代氛围息息相关。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交织着民族矛盾和种种社会危机的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惊破了唐王朝统治者金粉沉迷的酣梦;冀马燕犀的铁蹄,无情地扫荡了“开元盛世”的繁荣。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导致两京失守,乘舆播迁,中原板荡,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战乱虽然终于得以平息,却使得盛极一时的唐帝国元气大伤,并留下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两大难以克服的祸端,从此走向积弱积贫的衰败境地,以迄于亡国。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当白居易降临人间的时候,“安史之乱”的硝烟尚未散尽。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正值大动乱后的艰难恢复之际。中央集权被削弱,河北、山东地方割据势力膨胀,或则彼此

劫掠,或则连兵抗拒朝廷,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出生于中小地主阶层,家道中落的白居易,也饱尝了“孤舟三入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暮寝无安魂”的颠沛流离之苦。大历、贞元之际,惊魂甫定,脆弱而敏感的士人们,悼惜往日的繁华,使他们无限感伤和失落;渴望中兴的憧憬,又使得他们在满怀希望的期待中,夹杂着好梦难以成真的迷惘与焦灼。白居易正是在这种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氛围中长大成人的。

经过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几代人的准备和酝酿,到了上距安史之乱爆发整整半个世纪的顺宗永贞元年(即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以“二王八司马”^①为核心的新兴进士集团,终于掀起了旨在“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顺宗纪所书善政》),从而强化中央集权的“永贞革新”。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这次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改革,虽旋即归于失败,但它不愧是中唐政治史上一道亮丽的彩虹,唤起了渴望中兴的士人们对亟待疗救的衰敝不堪的社会现实的正视与关注。可以这样说,没有“永贞革新”的引导,便绝不会有接踵而来的“元和中兴”。

白居易是幸运的。当他秉承父祖辈明经及第的家世传统,以“儒家子”自命,在艰难竭蹶中,通过“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勤学苦读,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解褐为秘书省校书郎之际,正值朝廷发生了“二王八司马”掀起的政治改革;由于职位卑微,他虽然未直接介入这场斗争,却经历了这场政治改革的全过程。从他假托“为人”,实则为自己直接上给“八司马”中地位最高的韦执谊的《为人上宰相书》,以及他后来对八司马党人表示深切同情,并同其中的刘禹锡、李景俭等

^① 二王,据《旧唐书·顺宗纪》,指“永贞革新”后,被贬为开州司马的王伾,贬为渝州司户的王叔文。八司马,据《旧唐书·宪宗纪》,指遭贬斥的虔州司马韩泰、台州司马陈谏、柳州司马柳宗元、朗州司马刘禹锡、饶州司马韩晔、连州司马凌準、郴州司马程异、崖州司马韦执谊。

密切交往等事实来看,白居易对“永贞革新”分明是持同情乃至支持的态度^①。经历了这场虽被扼杀的政治改革的洗礼,促使初入仕途的白居易拓宽了视野,丰富了阅历,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从革新派横遭镇压的严酷事实,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下仕途的险恶;从改革中揭露出的种种矛盾和积弊,又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改革的艰巨性和迫切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兼济天下”,匡助“中兴”的宏愿。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场震惊朝野的政治风波,既为他在宪宗初政的“元和中兴”年代,以铮铮铁骨的“元和谏官”从事兴利除弊的政治实践,作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也为他在当时诗坛上倡导的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启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大方向。

二

从元和二年(807)冬自周至尉召入为翰林学士,至六年四月丁母忧出院的近四年时间里(期间同时先后任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白居易利用其身居近臣的地位,以及“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与元九书》),力图“剪削乱阶”,改变自贞元以来“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旧唐书·宪宗纪》)的局面,重振纲纪,再创“中兴”的大好机遇,以“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的壮心直气,全力投入兴利除弊的政治实践中。一方面,通过谏章和奏状向皇帝进言,拾遗补阙,参与军国政事,并对擅权蠹政,残民以逞的巨强藩、权豪贵近,给予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另一方面,又以诗歌作为辅助手段,借助于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疾贪吏,恤疲民,抨击社会黑暗,悯怀疮痍,为民请命。其诗有句云:“危言诋阍寺,直气忤钩轴”;“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正是白居易这一时期忠公

^① 参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太行路》诗笺,及拙著《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期)。

体国,不为身谋的战斗风貌的生动写照。尽管自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秋,白氏丁母忧蛰居渭村近四年之久,其意绪稍显颓放,但总的看来,直到元和十年遭构陷贬江州司马之前,其积极用世的态度始终是执著的。因此,我们认为,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是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

把白居易在这一时期所作奏章及讽谕诗,同他此前于贞元、元和之际所作《百道判》、《为上人宰相书》及《策林》等体现其政治理想 and 为政主张的论著结合起来看,他在其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主流,可以归结为激进的民本主义。白居易服膺儒家的民本主义传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动因。我们知道,民本主义,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就极其精当地揭示了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强调的治国必先安抚百姓的真谛。其后,孔子提倡“仁爱”、“修己以安百姓”;孟子主张“民贵”、“保民”,是民本主义的进一步发扬。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总是难以摆脱以标榜“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纵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凡是政治经济昌盛繁荣的时期,大抵也正是民本主义思想高扬的时期。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彪炳史册的李唐王朝,从总体上看,正是一个较好地继承了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朝代。纂集贞观时期君臣论对的史料,标榜“君人南面之术”的《贞观政要》,作为一部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政治史料专辑,由吴兢编著于开元前期,从而把“贞观”和“开元”这两个“盛世”联系起来,绝不是偶然的。

在贞元、元和之际,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顺应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人心思治,上层统治者也力图革除弊政,有所作为的历史趋势,企图走儒家经世致用的道路,颇欲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当时士大夫所渴望的“中兴”,正是为了整顿纲纪,挽回国力衰飒的颓势,以恢复贞观、开元时期的兴盛局面。这样,既然以富有民本主义思想的贞观、开元“盛世”作为追求的政治理想,那么,促成了贞观、

开元之治的民本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他所奉行的政治思想。质言之,白居易的民本主义思想,固然远绍先秦儒家的“仁政”传统,特别是继承了孟子“民贵”、“保民”的民本思想,实则直接汲取和承袭了反映贞观、开元时期的资治经验,作为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贞观政要》这部著作。这一点,只要我们将白氏早期的政论结集《策林》同《贞观政要》加以比照,就完全清楚了。举凡《政要》关于省政宽刑、轻徭薄赋,以安民为本的基本精神,均为《策林》所继承,只不过后者针对“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德宗贞元以来,纲纪废弛、政局败坏的种种痼弊,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已。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其社会政治结构而言,也可以说是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君”,同处于被压迫和奴役的社会底层的“民”之间的矛盾。介于这二者之间的“臣”——即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则是行使君主的意志,对广大劳苦民众实行压迫和奴役,从而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安邦治国的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过是如何处理好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罢了。

白居易的《新乐府序》,在谈到其政治讽谕诗的创作主旨时,曾明确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其实,就讽谕诗干预时政的目的性而言,主要是“为君”、“为臣”、“为民”这三个层面;而“为物”与“为事”,不过是前三者的延伸与具体化。这是白居易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在其文学实践中的反映。这种思想反映在其政治实践中也大体如此,即着眼于固本安民的根本问题,从弘扬君道、勸励臣节和关心民瘼这三个层面而具体展开的^①。

在“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弘扬君道,首先就要求唤起唯我独尊、可以任所欲为的皇帝本人,意识到自身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亡,从而强化道德意识,以德自修,以礼自律,惟度

^① 参阅拙著《白居易评传》第六章《白居易的前期思想——激进的民本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